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专门以《谈谈调查研究》为题，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方法 and 要求。2011 年 11 月 21 日的《学习时报》刊发了这篇文章。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在十年后重温习近平同志的这篇文章，更能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调查研究工作关乎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无论党的思想路线还是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在出台重要方针政策、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前，都会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坚持好这一优良传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使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好群众路线，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把握社会方方面面真实情况，才能在制定政策、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时做到心中有数。习近平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中指出，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这五个“深入”就是让领导干部抓住国家和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 陈 航 李军辉

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大事要事，聚焦对党的全局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着眼于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焦点，因时而进、因势而谋、因事而新，在观念、思路、措施、方法、机制等方面主动适应，时时跟进，使调查研究更好地服务领导决策，推动工作落实，引领创新发展。

调查研究的问题来自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自推进全面社会治理实践。只有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才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由于我们所肩负的任务不断变化，也由于党的领导干部是要不断地进行新老交替和不断地调换工作岗位，更由于客观事物也总处于变化之中，要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领导干部就必须真正把调查研究变为自觉的经常性活动。如果只是沉溺于“文山会海”，只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不深入实际，坐在办公室作决策，就会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也会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即使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再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再多，都不能代

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地进行调查研

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的提高，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掌握正确方法

习近平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中指出：“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

调查研究有没有成效，得人民群众说了算。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领导干部在困难面前带领群众克难攻坚、奋力前行，而解决困难的好措施、好办法都来自于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调查研究是

了解情况的过程，更是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作出正确决策，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坚持群众路线就是在调查研究时，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迈开步子，走出院子，进行实地调研，取得扎实有效的成果，拿到真实可信的结论。能够解决群众实际难题的决策，绝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够产生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表率，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宁德，再到主政浙江，每到一处工作，他总是要跑遍那里的山山水水，也加深了与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

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调查研究才有泥土气息，有群众声音的调查结论才有说服力。调查研究就是要“和群众坐一条板凳”，让群众打开话匣子，说出真心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带着一片真心去向群众“取经”，群众一眼就能看出来。沉下去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但仅仅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不够的，群众的意见有褒有贬，所以既要听顺耳好话，也要听逆耳之言；既“面对面”让群众直接提意见，也

“背靠背”让群众敢开口、敢于提意见，真正把群众意见充分收集起来，使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成为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

制度化的调查研究，能够保证决策更加科学，作风更加扎实

新形势下，我们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调查研究工作对我们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党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方面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更应该切实落实好，使这一优良传统真正成为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

切实将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坚持好。各项政策方针的制定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习近平同志指出：“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坚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就必须坚持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防止和克服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从程序上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作出决

策前，要八面来风，要兼听意见，找出规律，先谋而后断。

根据实际完善领导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制度。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曾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这是为调查研究的工作制度立下了规矩。“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从制度的角度使其成为一项经常化的工作。

更加重视调查研究联系点制度。习近平同志对调查研究总结出“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调查研究要了解真正的社情民意，达到“五字诀”的标准，建立固定的调查研究联系点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一以贯之，一竿子插到底，深入调查才能有助于了解实情、问计于民，提高调查研究质量。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始终关心基层联系点，关心联系点的群众。联系点制度的时间积累有助于增强调查研究的协同联动，实现上下贯通、点面结合，更加有效地指导推动工作，真正实现与普通百姓交朋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解决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

《谈谈调查研究》是习近平同志指导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方法、做好科学决策的一次系统阐述。如今重温这篇文章，依然能感受到习近平同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们今天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过上好日子——读〔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 李 进



1948 年，美国记者韩丁在北方大学执教期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回到美国后，韩丁根据在张庄收集到的资料，撰写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1966 年，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很大反响，不久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认知。

“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韩丁发现“翻身”是中国革命创造的一个重要词汇，他认为这对于旧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以及破除迷信、地位的变化等，他将书名定为《翻身》，旨在向大家叙述“张庄农民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经过”。韩丁强调，张庄土改的历史对于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 10 月公布实施，为各解放区土地改革提供了斗争纲领。韩丁认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解

放战争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无偿地解放了价值三十亿美元的财产”，《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鼓舞了全国各阶层的革命斗志。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封建买办势力，侵占中国大量土地，并以出租和雇工经营的方式，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韩丁强调，尽管中国农民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抗争，但是囿于农民政治力量有着“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缺乏远大目光”“行动上的急性病”等弱点，所以一直无法改变受压迫的境遇。韩丁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无产阶级领导”是群众“对腐朽无能的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的重要保证，由于中国共产党具备“预料和指明转折点的能力”，“努力研究一切有关的社会现象”，所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

韩丁认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正因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促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他观察到，周围的“共产党员把公众的利益摆在私人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放在眼前利益之上，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农民愿意接受他们的思想指引，变自发的行动为有指导的行动，“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

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团结是农民对付剥削阶级的基本武器，而农民之所以能使用这个武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

“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

在旧中国的农村，地主阶级“征收高额地租，赡养家丁”，贫苦农民却“让苛捐杂税夺去他们的大部分收成”，加上高额地租的剥削，农民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都无法得到保障。在与村民的交流中，韩丁得知富农郭福旺和郭春旺是张庄“最凶狠的雇主”，即便在灾荒年间，他们对佃户们也毫不留情。在 1942 年的灾荒中，苗家弟兄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口，郭春旺却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交租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

韩丁了解到，地主申金河是张庄的首富，拥有“一百四十亩好地”，收入比最富裕的中农还多好几倍。农民申发良为了抵偿他父亲欠下的八块多钱，从十四岁就到申金河家中当长工，但是申发良努力劳动几年后，不仅未能还清欠款，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经过土改，张庄的民众“已经彻底摆脱了债务的束缚”，从前“必须依靠当长工或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现在变为能够依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申发良不仅分到了田地 and 房子，而且“只要出力干活，打下粮食全都归到自家瓮里”，他向韩丁感慨道“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韩丁发觉，其他“翻身”的农民也有同样的心情，村里“形成了不寻常的幸福气氛”，许多贫农效仿八路军的习惯彼此称呼“同志”，打招呼从过去“吃了吗”变为“翻身了吗”，土改带来的这些转变

“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农民在土改中不仅改善了经济处境，还在政治上“翻了身”。韩丁接触到的中共领导干部，“没有中国的旧式官僚那种架子”，就像“一个埋头苦干的农民那样热情开朗”。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强制，也不是靠特权，而是靠说服教育，靠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村里日常工作来实现的。”新的乡村政权正式成立之前，农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农会、贫农团等组织，大家通过朴素的方式参与选举、监督干部，表达自身诉求。随着村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韩丁注意到，张庄的村人民代表大会中有 23 个代表“都是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农民”，他们是因为“在村里所起的作用而被左右邻舍选上的”，村民们“把全村最积极、最信得过、最优秀和最肯干的人选为带头人了”。

土改运动的展开，让“过去那些在旧制度下被动的、不声不响的受害者，越来越广泛地被推到积极的生活之中来，发挥出他们的从未想到的才能”。共产党让在旧社会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一跃成为了新政权的主人。

“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韩丁在对张庄的调研中，思考了旧中国农村生产力为何难以发展的问题。他认为，缺乏资金的农民们，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丧葬、疾病、春荒等紧急花费，而不是用于发展生产”，无益于促进农业生产。虽然地主阶级拥有资金，但他们不愿意“买农家肥料、培育优良品种、改革农具”，“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这种行为“只会加深和延

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乡村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本”。在土改中，中共把解决贷款问题作为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方面。韩丁发现，当地合作社或者新组织起来的县人民信用社能够向农民提供贷款，“信用社的主任和职员不是坐等农民找上门来借钱，而是亲自走访附近的乡村，直接调查农民的需要”，把资金交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张庄的村民感慨：“政府真关心我们老百姓。这次信用社又把钱直接贷到我们手里，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保证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生产。”

土改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土地问题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土地政策开始由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向分配地主土地转变。韩丁了解到，张庄经过 1946 年夏秋两季的分地斗争，“贫农获得了大约四百八十亩可耕地和几十间房屋”，两百户村民每家分得约四十块银元，“相当于一个雇农一年的收入”。农民们将分到的钱财立即购置生产资料，村里

的牲畜数目急剧增长，大车、犁、耒等各类农具也增加了不少。韩丁认为，“分配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运动的胜利，才能使人普遍幸福，才能大力支援在前方保卫革命的军队，才能在经济上战胜蒋介石的封锁。”

韩丁将张庄在土改后的生产发展，归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民终于有了土地和劳动工具，生产的粮食归自己所有，不再是流入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仓库，大家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行政部门、财政机关和各级群众团体制订的政策和坚定的组织工作”，“组织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组织起来增加生产”，也促进了生产的繁荣。

正如韩丁所言，中国数以万计的像张庄这样的村庄，在土改中逐步地走上“翻身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土地改革，让在旧社会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而且在政治上实现了翻身做主，汇聚起广泛的革命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行政管理改革》2021 年第 6 期目录

【本刊专稿】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研究	郭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理论 and 实践逻辑】	李鹏等
【依法治国】 公职人员职务违法惩戒制度的理论逻辑 and 有效实施	吴建雄
区域法治与新时代省域治理	戴小明等
【电子政务】 我国数字政府顶层设计的理念辨析与实践指向	王伟玲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比较——以广东、浙江、贵州三省为例	蒋敏娟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属地管理为主的异化及其对策	李一行等
我国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体制与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陈婕等
【社会保障】 国外退役军人保险治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岳宗福
嵌入式养老：农村地区农民集中养老新模式探索	李鸿渊
【阅读与评论】 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厚重成果——《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三部曲评介	周潇